



法语学科学术文库

La traduction
et l'éthique
du traduire

翻译与翻译伦理

基于中国传统翻译伦理思想的思考

王大智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翻译与翻译伦理

——基于中国传统翻译
伦理思想的思考

王大智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与翻译伦理:基于中国传统翻译伦理思想的思考/王大智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

(法语学科学术文库)

ISBN 978-7-301-19645-8

I. ①翻… II. ①王… III. ①翻译理论—研究—中国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6371 号

书 名: 翻译与翻译伦理——基于中国传统翻译伦理思想的思考

著作责任者: 王大智 著

责任编辑: 初艳红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9645-8/G·324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alice1979pku@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0 毫米×1230 毫米 A5 6.125 印张 200 千字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本书的出版得到辽宁省高等学校
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的资助
(项目编号:2009R14)

《法语学科学术文库》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许 钧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拼音为序)

- 曹德明 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褚孝泉 复旦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杜青钢 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傅 荣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户思社 西安外国语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克勇 四川外语学院院长,教授
刘成富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秦海鹰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许 钧 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真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袁筱一 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法语学科学术文库》总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科技、经济、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对外交流越来越频繁,中国的法语教育事业得到了空前迅猛的发展,目前国内开办法语专业的高等院校已逾 70 家。在办学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法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全国法语教育界不断探索,形成了本科、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学科的内涵也得到了不断的拓展,由传统的语言与文学领域,向文化研究、翻译研究、区域性研究和跨文化研究领域拓展。近年来,为满足国家多层次的法语人才需要,又在国内一些院校的法语专业设置了翻译硕士专业学位。为保证教育质量,法语学科的学术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刻不容缓。为加强法语学科建设,提高师资的学术、教学与科研的水平,促进学术交流,提高教学质量,我们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积聚全国法语教学研究的界的力量,组织出版《法语学科学术文库》。

顾名思义,《法语学科学术文库》是一套学术性丛书。我们知道,在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法语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期,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就先后获得法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授予点;90 年代,武汉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又获准设立法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授予点。在新的世纪,北京外国语大学也设立了法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授予点。最近,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也在获得的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的授权范围内设置了法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点。除此之外,复旦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校的法语教师还在所在学校的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博士点上招收与指导法语语言学与

应用语言学方向的博士生。与此同时,不少学校,如西安外国语大学,还尝试着与法国一流或著名高校合作培养博士研究生,探索法语高级人才培养的新途径。通过多年的努力,上述这些学科点为我国法语教学与研究界培养了一大批高级法语教学与研究人才,在法语教育事业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我们所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语语言文学学科培养了近 50 名博士,他们的研究涉及与法语语言文学专业相关的文学、语言、翻译和文化研究等领域,研究视野开阔,研究途径丰富,其中有两篇论文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一篇论文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在全国外国语言文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若要进一步提高我国的法语语言文学学科的教育与科学研究水平,拓展学科内涵,需要我们在学术研究方面做进一步的努力,将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推向社会,在为法语学科的发展奠定学术基础的同时,不断扩大法语语言文学学科在外国语言文学界的影响,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全国法语教育界同仁的大力支持。《法语学科学术文库》有着明确的宗旨:推进学科发展、促进人才培养、提高研究水平、扩大学科影响。鉴于此,我们认为《法语学科学术文库》应遵循如下几个原则:一是提倡开放性,学术研究应该与社会需求和发展密切联系,有利于学科领域的拓展。二是注重原创性,收录的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用中文或法文撰写均可,作者一般须拥有博士学位或高级职称,具有良好的学术背景与学术声誉。三是强调学术积累性,通过不断的积累,形成中国法语学科研究的特色,同时培养一批中国法语学科教学与科研的中坚力量。

《法语学科学术文库》的编写与出版,是我们全国法语界共同的事业,其目标是否可以达到,有赖于全国法语语言文学界的共同努力。我们期盼着全国法语界同仁的关心与支持。

许钧

2011年10月18日于南京大学

前 言

翻译是一项历史悠久、复杂且特殊的人类行为，它以造福人类为终极目的，以满足不同人类群体的交往需要为根本动因，以译者有意识、能动的语言转换活动为实现翻译目的的手段。人类翻译活动的诸要素，无论作为广义翻译主体的译者、作者、读者，还是相关的语言、文化、翻译目的等都具有社会伦理属性，伦理性因此成为翻译的一个本质属性。这就意味着，从翻译伦理的视角审视人类的翻译行为，不但可以增进对翻译活动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更加公允地评判人类的翻译行为、更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活动。展开翻译伦理研究成为翻译学学科发展的一种内部需要。

虽然只要有翻译实践活动，对翻译伦理的思考就必然伴随始终，但是长期以来，受人类对翻译本质属性认识的局限性影响，翻译伦理研究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世界范围内系统、深入的翻译伦理研究至今只有二十余年的历史，中国的翻译伦理研究仅仅处于起步阶段。据翻译史家推测，华夏民族从事翻译实践活动的历史已有数千年，而近代以前中国翻译史上几次大规模翻译运动发生、发展、繁荣、衰败之时正是以伦理中心主义为主要社会政治运作模式的儒家伦理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中国传统翻译伦理思想的丰富性与特殊性是不容置疑的。然而，无论对于中国传统翻译伦理思想的挖掘、整理与分析，还是对“翻译伦理”概念的界定，抑或是对外国有代表性的翻译伦理研究成果的全面而深入的译介，在中国翻译理论界均未全面展开。为使翻译伦理研究走得更远，为使日后我们提出的翻译伦理原则真正能够对翻译实践活动发挥指导作用，在本书中，我们将尝试着对上述关系着翻译伦理研究未来发展的基础性研究内容做初步

的阐发。全书由绪论、正文四大章节和最后的结语部分组成。

在绪论中,我们首先以全球化时代日益凸显的翻译伦理问题为切入点,提出展开翻译伦理研究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接着,通过对“伦理”、“翻译”、“翻译伦理”等相关理论术语的释义,我们将对翻译的伦理属性予以揭示并明确普遍意义上的翻译伦理研究不仅包括翻译的规范性研究,而且还包括对翻译规律或者翻译现象的描述性研究。在对中国翻译伦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审视中,我们将厘定本研究的主要研究范围并明确本研究的研究方法。

在第一章中,我们将对西方翻译研究发生“伦理转向”以来有代表性的翻译伦理思想进行梳理、分析和比较,以期为我们的翻译伦理研究提供理论参照与借鉴。通过对“贝尔曼的理想主义翻译伦理”、“作为‘翻译政治’的翻译伦理”以及“功能主义的翻译伦理”等三大具有鲜明特征的西方翻译伦理思想形成过程及内容的研究,我们发现,任何翻译伦理思想的提出都是对翻译实践所引发的具体伦理问题的回应,真正能够对翻译伦理危机起到化解作用的翻译伦理思想均产生于对翻译传统和翻译现实的清醒认识,产生于对传统翻译伦理观念的继承和批判。这也就是说,对异域翻译伦理思想的简单挪用不足以彻底解决现实存在的、具体的翻译伦理问题,因此,除了要坚持不懈地从外国翻译研究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中汲取理论灵感外,对本土传统翻译伦理思想的挖掘、整理、分析、继承与批判就成为我们从事翻译伦理研究不该跨越的重要环节。

在尚未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传统中国,在以伦理中心主义为主要社会政治运作模式的中国古代社会,规模相对较大的翻译运动先后发生了两次:东汉至北宋初年的佛经翻译活动以及明末清初以传播天主教为主旨的西学翻译活动。鉴于此,在本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我们将分别对上述翻译运动期间有代表性的翻译伦理思想进行梳理和分析,同时对隐藏在翻译伦理背后的、对翻译伦理思想的形成起着决定作用的种种“依据”进行挖掘。我们发现,同为由异域宗教信徒主动传入、具有排他性的宗教信仰,佛教和天主教在进

入中国之初均经历了一段相当艰难的时期,然而,走出沉寂期后,二者在华的传译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通过第二章的论述,我们发现,佛经汉译活动之所以能由最初为满足弘法需要而开展的小范围译介活动发展成为国家的重要文化事业,这与佛经汉译者在“华夷之辨”这一族际伦理以及中国主流伦理思想的巨大压力下灵活地采取依附或者至少不违背主流伦理思想的翻译伦理原则有直接关系。当佛经翻译以有裨政治的面貌出现时,翻译活动就可能获得国家或帝王的赞助,进而获得长足发展;当佛经翻译对中国主流伦理思想构成威胁时,佛经翻译活动就必然遭到禁止。可见,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对佛经汉译活动的发生与否起着决策作用,同时,内容各异的翻译伦理思想又关系着翻译活动的兴与衰,关系着翻译对主流伦理思想的改造或颠覆。通过第三章的论述,我们发现,天主教汉译活动之所以由最初以取悦封建帝王和士大夫为目的的灵活的译介活动发展到被清王朝明令禁止,译者遭受迫害甚至被驱逐,这与罗马教廷以及某些天主教传教士为保持宗教的纯洁性,在中西文化交流初期就坚决推行“忠实于原文”的翻译伦理,而使文化冲突不断升级有直接关系。这样,以佛经汉译的成功以及明末清初西学翻译的失败为例,我们不仅对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翻译伦理思想做了基本的梳理和分析,而且还从正反两个方面揭示了翻译、伦理以及翻译伦理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完成了对中西方形形色色的翻译伦理思想尤其是中国丰富的传统翻译伦理思想的挖掘与分析后,在本书的第四章,我们试图对中国传统翻译伦理思想的基本特点进行归纳和总结,进而对翻译伦理的本体维度、历史维度以及翻译伦理的相对向度做出理论上的揭示。据此,我们提出了树立相对主义的、开放的、多元的、动态的翻译伦理观的主张,这也是我们通过对中国传统翻译伦理思想的研究而对“翻译伦理”概念所做出的进一步诠释。

在结论部分,我们将对本研究进行总结并对日后深入的翻译伦理研究在研究方向与研究内容上提出若干建议。我们既肯定了本研

究在揭示伦理、翻译与翻译伦理的互动关系以及翻译伦理的维度与向度等方面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又对从翻译伦理的视角重新书写中国翻译史,将翻译伦理的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翻译教学、翻译批评以及译者道德研究结合起来从事翻译伦理的致用性研究等方面提出了若干建设性意见,以期进一步开启中国翻译伦理研究的研究空间,使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人员和译者投入到翻译伦理研究中来。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翻译伦理问题的凸显	1
第二节 “伦理”、“翻译”、“翻译伦理”释义	3
第三节 中国翻译伦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10
第四节 本研究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	16
第一章 翻译研究的伦理转向	19
第一节 翻译研究伦理转向的萌动	21
第二节 作为“翻译政治”的翻译伦理	28
第三节 功能主义的翻译伦理	52
第二章 华夏民族“以夏变夷”的族际伦理与佛经汉译伦理	58
第一节 伦理中心主义、华夷之辨与佛经翻译	60
第二节 依附黄老之学或儒学下的“存质”与“尚文”(两汉、三国时期)	66
第三节 依附并试图超越玄学的翻译伦理(两晋、南北朝时期)	81
第四节 以尊重佛教原典为主的翻译伦理(隋、唐时期)	103
第五节 儒家正统地位的恢复与佛经翻译的衰败	117

第三章	华夏民族“立夏夷之防”的族际伦理、实学伦理与明末清初的西学汉译伦理	122
第一节	立夏夷之防、实学伦理与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	122
第二节	从依附佛学到“附儒”与“超儒”的翻译伦理	128
第三节	无奈的偏离与偏离中的“偷运军火”：科学翻译中裹挟天主教思想的翻译伦理	143
第四节	翻译伦理之争与西学翻译的终结	147
第四章	中国传统翻译伦理思想的基本特点及给我们的启示	151
第一节	中国传统翻译伦理思想的基本特点	151
第二节	翻译伦理的维度与向度	156
	结 论	167
	参考文献	176

绪 论

第一节 翻译伦理问题的凸显

翻译是一项历史悠久、复杂且特殊的人类行为。人类目前在翻译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表明,翻译史家对翻译发生的本源基本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早在远古时代,自从身处不同文化背景、操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有了交流的需要,翻译实践便应运而生了。从翻译活动发生的初始年代到人类已经大踏步进入的 21 世纪,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甚至无可替代的作用。如果说,而今之后,人类不可一日无翻译,翻译正推动人类社会走向繁荣与富裕,这似乎并不为过。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文化交流的空前频繁使人类对翻译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翻译实践活动的复杂性及翻译研究的重要性也因此在学术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认可与重视。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翻译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展开,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相继发生。从最初围绕翻译实践而阐发的零星的、经验主义的思考,到借助各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从不同途径对翻译展开的种种理论探索,人类对翻译本质属性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翻译本质属性认识的逐步深入,翻译的价值问题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许钧教授从翻译的社会价值、翻译的文化价值、翻译的语言价值、翻译的创造价值以及翻译的历史价值等五个方面充分肯定了翻译对于沟通人类的心灵、推动社会的变革、促进文化的积累与创新、改造民族语言以及推动历史的进步等方面的

积极作用^①,这些都属于翻译的正价值。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解构主义翻译研究、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以及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从不同角度深刻揭示了翻译这一常常被人们误以为能够发挥客观、中立作用的语际转换活动完全可能充当政治斗争的工具,以相当隐蔽的方式建构和强化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形塑不同的文化身份、强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②、人为地将女性置于父权统治之下进而制造男女不平等的过程中发挥十分重大的作用^③,这些都属于翻译的负价值。由此我们发现,翻译在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起着巨大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伦理问题;人类的翻译行为既不是至善的,也不是价值中立的,它可以是使某一民族文化永葆青春的万应灵药^④,也可以是将其不平等地位长久化或永久化的毒药,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来的火种可以温暖这个世界,也可能将这世界烧毁。

翻译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加剧文化隔阂甚至引发文化冲突的严重后果令人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从翻译研究领域内已普遍发生的两次转向看,翻译研究的语言学理论致力于翻译的内部研究,过于强调语言的规律性、工具性及科学性,这就必然导致对译者主体性的抽离,导向对翻译行为价值中立的错误判断,在语言学派看来,人类的翻译行为仅仅是一种语言转换行为,与伦理并无关系;翻译的文化研究致力于对翻译过程的外部制约因素的研究,这使得该研究能够对翻译行为背后隐含的伦理问题予以部分揭示,但似乎又无以提供化解伦理危机的有效途径。身为译者和翻译研究

① 参见许钧:《翻译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80—395页。

② 参见劳伦斯·韦努蒂:《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转引自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59—361页。

③ 参见谢莉·西蒙:《翻译理论中的性别》,转引自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10—316页。

④ 参见季羨林:“翻译之为用大矣哉”,《译林》,1998年第4期。季羨林先生在谈到翻译的作用时,是这样说的:“中华文化之所以能永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人员,我们不禁思考下列问题:人类从事翻译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翻译是被用来造福人类还是危害人类的?我们应该如何翻译才能避免或化解翻译所引发的伦理危机,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翻译的积极作用、抑制翻译的消极影响?翻译研究应该向何处去?如何让曾在出走途中不断加深了自我认识的翻译研究最终回复到自身,使其能够真正承担起为翻译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支撑、进而推动人类进步的伟大使命?

这是一个由翻译实践活动引发的有关“应该如何翻译”的翻译伦理问题系,其中也包括翻译理论研究人员及译者的社会责任问题。翻译对人类的存在与发展所起的作用愈大,人们对翻译作用的认识愈全面、愈深刻,针对上述翻译伦理问题系的思考愈会引起译者及翻译理论研究人员的重视。

我们知道,对于人类行为所引发的种种伦理问题,人文学科中将其作为研究内容和为其提供解决途径的伦理学。由于翻译行为首先是一项人类行为,对于翻译所引发的某些伦理问题,无疑,伦理学能够从理论上做出部分解答,而且也可能成为解决某些问题的现实力量。然而,翻译行为又是一项异常复杂、非常特殊的人类行为。若要为翻译所引发的各类具体的伦理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有效的、直接的解决办法,将翻译研究与伦理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具体的翻译伦理研究中寻求能够指导翻译行为向善的、理性的翻译伦理原则未尝不是一项有益的尝试。

第二节 “伦理”、“翻译”、“翻译伦理”释义

如今,若开启翻译伦理研究,首先我们需要对“伦理”、“翻译”、“翻译伦理”等理论术语释义,因为,只有明确了上述概念的含义与涉及内容,我们才能据此确立翻译伦理研究的研究范围。

“伦理”二字在中国古已有之,最初“伦”与“理”是单独使用的。

“伦”主要的意思为“和”，如，“八音克谐，无相夺伦”^①；“理”的原义则为“治玉”，如，“玉之未理者为璞，剖而治之，乃得其鳃理”^②。中国伦理学界将“伦理”二字的首次组合使用上溯到西汉时期^③，《礼记·乐记》中有“乐者，通伦理者也”^④的说法。显然，这些与我们今天所探讨的作为伦理学概念的“伦理”的意义并不相同。中国古代虽然有着异常丰富的伦理思想，但是伦理学始终没能以学科的形态建立起来，当然更不可能拥有现代意义的、固定的、明确的伦理学术语。直到近代，日本人在对西方伦理学著作的翻译中，借用汉语中的“伦理”二字翻译了英语中的 ethics 一词，受其影响，中国人开始用“伦理”指陈人际关系的规律与规范。在西方，ethics 源自希腊文“ethos”，意为“本质”、“人格”、“风俗”、“习惯”，其实它所探讨的就是有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需要指明的是，如今，在汉语的语境中，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在使用“伦理”这一概念时，常与“道德”二字合用或混用。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ethics(伦理)与 moral(道德)也常被混用，不过目前看来，前者出现的频率更高。据考证，当初西塞罗(Cicéron)在将希腊语 ethics 翻译为拉丁语时，为了丰富拉丁语的语汇，以同样具有“风俗”、“习惯”意义的拉丁文 mores 为词根，创造出了 moralis 一词^⑤。由于对这两个概念的不同诠释“决定着各种伦理学理论的不同走向”^⑥，东西方均有不少伦理学家对上述概念进行过严格的区分。例如，德国的黑格尔认为，moral 指“个体道德、品行，它是主观修养与操守”^⑦，“ethics 则指客观伦理关系，ethics 化为个人的自觉行为，变

① 转引自高兆明：《伦理学理论与方法》（伦理学前沿丛书之基础理论探究系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页。

② 同上书，第9页。

③ 参见刘可风主编：《伦理学原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1页。

④ 转引自何怀宏：《伦理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⑤ 参见何怀宏：《伦理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⑥ 同上。

⑦ 高兆明：《伦理学理论与方法》（伦理学前沿丛书之基础理论探究系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页。